

## 香事書寫如何展現世界？以晚明《香乘》 為主的探討

黃莘瑜\*

晚明出現中國歷代最為完備的「香譜」，即周嘉胄所撰《香乘》。周氏藉焚香、酣睡以遁世，似欲隔離財富、權勢的競逐與滄桑；然而財富和權勢，偏偏又與「香」的流動、持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其所以傾注畢生之力纂輯，非僅嗜癖使然，更可視為個人嗜癖牽掣於香品流動、持有機制的對策。按其所述，名香除了寺廟以外，大抵唯有最高集權者足堪享用；至於隱居在野者，唯能以「書寫」囊括「嗜物」。此與十五世紀前期「鄭和下西洋」，乃至十六世紀以降全球趨向整合的劇烈變動，是否或可能存在何種關聯？這些遠域香物與產香之地，又如何織入中國世俗見聞、知識的系統？縱使官方與部分士人一度主張「禁番香」；然而西洋香物不僅深入士人生活，更堂皇接榫中國雅正文明的譜系。

關鍵詞：明代、香、中國、西洋、全球化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Email: liberative@gmail.com。

## 引論

「香之為用從古矣」<sup>1</sup>，現存「香譜」則最早撰於北宋。<sup>2</sup>宋元之際學者熊朋來（1246-1323）謂「香譜」之作：「非世宦博物，嘗杭舶浮海者，不能悉也。」<sup>3</sup>此由政治權力、博物見聞與海洋貿易架構的視野，就探討有關「香」之認知與評價，如何以文化結構的形式，彙整於地理、貿易、權力與意識形態交錯的書寫線索？洵具啟迪之功。

縱使香之「神聖性」與「隱喻性」，向來昭著於古典詩文與士人傳統。例如李維楨（字本寧，1547-1626）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為晚明《香乘》作序，<sup>4</sup>便分別由儒、佛、道的脈絡，稱述「香」能溝通神聖領域，或作為度化、修煉的媒介；<sup>5</sup>且從撰者周嘉胄（字江左，1582-1658）與其同屬楚人的背景，將兩人「好香」之興致，一併歸諸「以香草比君子」的隱喻傳統。<sup>6</sup>然而「世俗」、「感覺」、「欲望」的層次，實與「神聖性」、「隱喻性」並存於香事書寫的實踐。即就《香乘》來說，異於純粹之賦詩摘文，書題摹擬「史乘」<sup>7</sup>，且以「記」體為主的文本纂輯，便大量牽連與感官享受、世俗意欲相關的見聞、知識。

<sup>1</sup> [宋] 丁謂，〈天香傳〉，收錄於 [宋] 陳敬，《陳氏香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4，〈傳〉，頁 333。

<sup>2</sup> 參〈《香譜》提要〉，收錄於 [宋] 洪芻，《香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217-218。

<sup>3</sup> 見熊朋來署於「至治壬戌」（元英宗二年，1322）之〈《陳氏香譜》原序〉，收錄於 [宋] 陳敬，《陳氏香譜》，頁 240-241。

<sup>4</sup> [明] 李維楨於〈《香乘》序〉末署：「萬曆戊午中秋前二日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見 [明] 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1641]原刊、清康熙元年[1662]印本），卷首，頁 3a。以下簡稱臺北國圖藏刊印本。

<sup>5</sup> [明] 李維楨，〈《香乘》序〉：「所謂返魂香之說，皆未可深信，然《詩》、《禮》所稱燔柴事天……達神明、通幽隱，其來久遠矣。佛有眾香國，而養生煉形者亦必焚香，言豈盡誣哉！」見 [明] 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圖藏刊印本），卷首，頁 1b-2a。

<sup>6</sup> [明] 李維楨，〈《香乘》序〉：「以香艸比君子，屈宋諸君騷賦纍纍不絕書，則好香故余楚俗。周君維揚人，實楚產，兩人譬之艸木，吾臭味也。」見 [明] 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圖藏刊印本），卷首，頁 2b-3a。

<sup>7</sup> 《孟子·離婁》：「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頁 413。

而此類見聞、知識，不僅關乎生活風格的經營，還往往沾帶殊域往來、獵奇之塵寰百味，以及階層映襯下的榮華與優越。<sup>8</sup>

自宋以降，「香譜」迭出；迄於晚明，則出現中國歷代最為完備的「香譜」。論題「香事書寫」，既包含涉及「香」之詩文範疇，更以《香乘》為延伸探討的輻輳。《四庫提要》稱周嘉胄歷經二十餘年所撰《香乘》：「自有『香譜』以來，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香嚴三昧》十卷，篇帙最富。嘉胄此集，乃幾於三倍之，談『香事』者，固莫詳備於斯矣。」<sup>9</sup>《香乘》於前代文獻採摭之富，固然足以稱述；但本文更加關注，此書記述、徵引當朝見聞、知識的脈絡。

像是「永樂至宣德間，選往西洋，四次隨〔鄭和〕征」，<sup>10</sup>與馬歡(1380-1460)同為通事的費信(1388-?)所撰《星槎勝覽》，便屢受《香乘》採納為考訂香物的憑據。<sup>11</sup>這不禁令人好奇，明代中葉至明清之際士人的「香事」書寫，與十五世紀前期明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乃至十六世紀以降全球趨向整合的劇烈變動，是否或可能存在何種關聯<sup>12</sup>？這些遠域香物與產香之地，又

<sup>8</sup> 早在盛唐賈至(718-772)〈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衣冠身惹御爐香」，與杜甫(712-770)、王維(約699-761)相繼賡和的詩句：「朝罷香烟攜滿袖」、「香煙欲傍袞龍浮」，「香」便已然成為詩人點染皇都殿宇、早朝威儀的重要意象。參〔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5，〈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與後附賈至〈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頁427-428、430-431；〔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10，〈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頁177。

<sup>9</sup> 〔明〕周嘉胄，《香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香乘》提要〉，頁353。以下簡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香事」領域原本尚待發展，「香譜」研究更顯缺乏。劉靜敏為較早從事宋代相關文獻整理的學者，撰有〈丁謂「天香傳」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9(2004)，頁145-174；〈宋洪芻及其《香譜》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2006)，頁59-102；〈《陳氏香譜》版本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3(2006)，頁45-78。至於學界對《香乘》與周嘉胄的認識，可謂鳳毛麟爪。張竹慧，〈香料的百科全書：以《香乘》一書為例〉，《新北史學》，13(2013)，頁31-55，則頗有鉤沉之功。

<sup>10</sup>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星槎勝覽序〉，頁10。

<sup>11</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64；卷5，〈香品〉，頁390、393、395；卷9，〈香事分類〉，頁423；卷10，〈香事分類〉，頁432；卷12，〈香事別錄〉，頁446。

<sup>12</sup> 如此提問，並非認定這些書寫者，直接參與「下西洋」或「地理大發現」後貿易網絡或帝國組織的「交流」、「互動」；亦非純粹視其為敘述、印證「職貢貿易」或

如何織入「中國」世俗見聞、知識的系統？

《四庫提要》的著眼點，顯然在《香乘》的目錄學定位，亦即同類典籍的歷史聯繫；本文第一、二節則將借助「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視野，透過《香乘》徵引明人著作，與作者見聞併見解的梳理，突顯其對當代訊息、文獻的重視，與有明一代香物流動場域的記載。此皆牽涉最稱完備之「香譜」，可能呈現的時代特徵；縱使與當代學界矚目之全球變動趨勢，未必疊合於同一層次。

此外，就香物產地而言，《香乘》涉及「西洋」的線索，具體狀況為何？由此延伸的海洋視野，可否印證士人的知識結構或意識形態正發生變化？且是在哪些「情境」(context)下，「疆界」意識會受到強調或淡化？<sup>13</sup>「西洋」香物與「中國」的文雅傳統，又是否存在實際的「疆界」？而氣味與權勢之間弔詭、複雜的關係，以及與《香乘》對映參照之國家、社會的百態樣貌，均為本文第三、四、五節所欲探索的面向。

## 一、隱者之香與全球化視角下的香貨

縱使香貨流通，依賴極為世俗的交易活動；然而士人書寫脈絡之「香」，輒帶有內向、沉靜的況味。「香」與「隱者」的聯繫，於古典詩文往往可見。像是以「香癖」自居的黃庭堅(1045-1105)，<sup>14</sup>便於〈書小宗香〉歎賞宗炳(375-443)

「全球化歷史」的「史料」，甚或當作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因。相對地，在此探尋「可能的關聯」，並未排除面臨全球整合之機會或趨向時，基於文化認同或政治利益，而選擇固守疆界的回應方式。

<sup>13</sup>此處受到王明珂從「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歷史記憶」詮釋「華夏」族群現象的啟發。王氏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序論〉說明其所欲建立的族群理論，並非為了回答「我們是誰」，而是希望解答「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而此提問方式轉換的學術背景，則說明於書中第一部分，簡言之，由於二戰以來人文科學者對於「異文化」與「過去」的反思，民族研究「由核心內涵轉移到邊緣，由『真實』(reality)轉移到『情境』(context)，由識別、描述『他們是誰』轉移為詮釋、理解『他們為何要宣稱自己是誰』」。參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頁7-8、20-21、407。

<sup>14</sup>見〔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宋〕史容、〔宋〕史溫注，《黃山谷詩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60)，〈賈天錫惠寶薰，乞詩，予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字，作詩報之〉之5，頁54。

之孫茂深，既如祖父素行高逸，「嘉遁江湖之間」，且「惟喜閉閣焚香」，貴人欲與交游皆不得，以致僅能透過畫像，仰慕這位傳奇人物。<sup>15</sup>黃氏此文不僅受到宋元之際《陳氏香譜》重視，<sup>16</sup>晚明《香乘》並見收錄，且兩書皆述及記載宗炳生平的《南史·隱逸傳》。<sup>17</sup>

崇禎十四年（1641）周嘉胄自序《香乘》：「好睡嗜香，性習成癖。有生之樂在茲，遁世之情彌篤。」<sup>18</sup>固然賡續士人傳統對隱者身分的認同；但他於序文並未採取前代故事，卻與時人詩文相互呼應——「每謂霜裏佩黃金者，不貴於枕上黑甜；馬首擁紅塵者，不樂於爐中碧篆」<sup>19</sup>，其中「霜裏佩黃金」、「馬首紅塵」，併見同代唐寅（1470-1524）、袁宏道（1568-1610）之詩文。<sup>20</sup>此就本文而言，格外值得留意。

倘若參考唐寅、袁宏道的詩文脈絡，則周氏不啻想藉由焚香、酣睡，遁離膠輻於財富、權勢的峻厲與滄桑；弔詭的是，財富和權勢，偏偏又與「香」之流動、持有，存在千絲萬縷的連繫。相對於宋代《香譜》側重聯結士人風雅，<sup>21</sup>《香乘》則未割棄高蹈之外，更為龐雜的現實面相。不僅將「宮掖諸香」獨立成卷，裒集先秦以降宮掖用香諸多記載與傳說；卷 25〈獵香新譜〉作為有明一代的記錄，「獵」既揭示心態，更專收「國朝大內及勳璫夷賈，以至市行時尚、奇方秘制」，亦含嘉靖、萬曆「兩朝取香、香稅」等事。<sup>22</sup>縱使鄭和（1371-1433）的航海事蹟，如同受到「匿藏」或「忽略」的檔案，<sup>23</sup>並

<sup>15</sup>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1，〈書小宗香〉，頁 11。

<sup>16</sup>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 3，「黃太史四香」條，頁 300。

<sup>17</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7，〈小宗香〉，頁 484-485。

<sup>18</sup> 見 [明]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圖藏刊印本），卷首，〈自序〉，頁 1a。

<sup>19</sup> 見 [明]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圖藏刊印本），卷首，〈自序〉，頁 1a。

<sup>20</sup> 〈題畫〉 24 首其 4：「一叢樓閣空江上，日有群鷗伴苦吟。盡勝達官憂利害，五更霜裡佩黃金」。見 [明]唐寅著，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寅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 3，〈題畫〉，頁 132。〈天池〉：「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低迴片晷，宛爾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天池〉，頁 172。

<sup>21</sup> 參 [宋]洪芻，《香譜》，頁 217-237；[宋]陳敬，《陳氏香譜》，頁 239-347。

<sup>22</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獵香新譜·稅香〉，頁 558-559。

<sup>23</sup> 許振興，〈《皇明祖訓》與鄭和下西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2010），頁

未出現於〈獵香新譜〉；但宮廷顯貴（大內）、外國商賈（夷賈）與得勢的宦官（勳璫），<sup>24</sup>正是西洋香物流動場域的權力／利益要角。

根據羽田正的研究，涵蓋「印度洋、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在內，所謂「亞洲海域」，自十五世紀末開始，便逐漸成為世界商品流通的中心。<sup>25</sup>上田信則自「交易」的動機與類型，試圖分析海洋與明清帝國的關係。其指出鄭和雖完成東南亞、印度洋的遠征，但在十五世紀前半，一般官員與知識分子，均漠然於海外訊息；直到十六世紀末，「知識分子開始對外面的世界感到興趣」。但其例證，書中僅見羅懋登（1517-?）之《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後簡稱《下西洋記》）。<sup>26</sup>但除《下西洋記》外，另有多少同期著作符合十六世紀末知識界轉向海外探求的判斷？以及他們是基於何種動機、目的，想要對外探求？容或還有商議的餘地。

羅氏《下西洋記》成書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sup>27</sup>周氏《香乘》則在崇禎十四年（1641）付梓，<sup>28</sup>兩書性質截然不同，但都相當倚重費信之《星槎勝覽》。<sup>29</sup>倘使參考上田氏的意見，則《香乘》的編纂，甚有可能被解讀為支持知識界興趣轉向的例證；更何況《香乘》還數度引用，<sup>30</sup>收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繪製之「山海輿地全圖」、刊刻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方輿勝略》。<sup>31</sup>換言之，《香乘》的確間接涉及航海貿易與全球交流的脈絡。然而是否能夠就此判斷，周嘉胄編纂此書，乃基於「對外面的世界感到興趣」？單由前述「香」與「隱者」的聯繫，恐怕就未必容易遽下定論。

67-86。

<sup>24</sup>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2008），頁163-192。

<sup>25</sup>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臺北：八旗文化事業公司，2018），頁19-24。

<sup>26</sup>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頁36-37、308-310。

<sup>27</sup>〔明〕羅懋登，《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7。

<sup>28</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香乘》提要〉，頁352。

<sup>29</sup>馬幼垣，《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64-65。

<sup>30</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71、卷3，〈香品〉，頁374、卷4，〈香品〉，頁383、卷12，〈香事別錄〉，頁446-447。

<sup>31</sup>〔明〕程百二，《方輿勝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366-367。

《香乘》付梓之際，全球趨向整合的劇烈變動早已開啟；此一變動，亦為逾半世紀的學界所矚目。有關連結亞洲、歐洲與東北非的「香料貿易」(spice trade)，「年鑑學派」第二代學者費爾南·布勞岱爾(或譯為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早在 1950 年代所著《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sup>32</sup>與 1980 年代初版之《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sup>33</sup>即將「香料」的貿易與運輸，<sup>34</sup>視為重要的考察對象。

至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所撰全球史敘事《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則指出十七世紀「海域裏和海域上空圍繞著中國發生的事，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全球經濟的公司化、國際法的出現大有關係」<sup>35</sup>；而促成這種種與當今世界依然密切相關，蓬勃、生動貿易網的核心動力，正是「香料貿易」。此前《經濟學人》亦將歐洲人最早為獲取香料，航行至亞洲的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於 1498 年抵達印度南部的科澤科德(Calicut)的行動，稱為歐洲步入「現代」(modern age)的開端。<sup>36</sup>

科澤科德在中國稱作「古里」，為信奉「釋教(佛教)」與「回回教(伊斯蘭教)」的「西洋大國」，鄭和在達伽馬抵達逾半世紀前，便銜永樂帝(1360-1424)之命，至彼地進行封賜與貿易。<sup>37</sup>「古里」只是明朝職貢貿易之一環，香貨產地既廣被南亞、東南亞，而明人獲取的途徑，亦不限於職貢。據岸本美緒的研究，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南海區域的主要貿易對象，相較於日本、朝鮮和

<sup>32</sup>費爾南·布勞岱爾著，唐家龍等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816-848、921-923。

<sup>33</sup>費爾南·布勞岱爾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冊 1 (新北：廣場出版社，2012)，頁 203-207。

<sup>34</sup>此處以食用香料胡椒為大宗，與《香乘》主要記述的焚薰之香不同。羽田正則以 spice (香辛料) 和指涉範圍更廣的法文 épice (香料) 區分二者，參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頁 33。

<sup>35</sup>卜正民著，黃中憲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21、23、227、244。

<sup>36</sup>“A taste of adventure: The history of spices is the history of trade,” *The Economist*, 1998.12.17. 參見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9810>，擷取日期 2019.5.26。

<sup>37</sup>[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占城國」條，頁 42-50。

歐美諸國，中國更佔大宗。<sup>38</sup>樊樹志則以「『海禁一朝貢』體制的突破」、「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為晚明史開端，<sup>39</sup>以突顯晚明變局「不是中國內部悄悄發生」的孤立事件。

周嘉胄這位自稱想藉焚香、酣睡以遁世的讀書人，具有怎樣的世界觀？或者他所爬梳、彙整的當朝文本，與變動中的世界有哪些關聯？底下將就《香乘》之時代特徵，及書內指涉西洋的線索，試圖釐清相關香事書寫，是否反映當代學界矚目之變動趨勢？或在多少程度上，與此視域產生交集或拉鋸？

## 二、《香乘》對明人著作的徵引

《香乘》不僅〈自序〉與時人詩文遙相呼應，作為纂輯「香事」之集大成者，既遠紹前代「香譜」、相關文獻，更旁蒐當朝著作，輔以周氏個人見解。因此有關知識、見聞之匯集，具有相當鮮明的時代特徵。除了收錄明景帝（1428-1457）景泰三年（1452）成書的《晦齋香譜》，<sup>40</sup>《香乘》另引用明人著作，今則初步表列如下：

《香乘》徵引明人著作及卷次	
《香乘》所引明人著作	引用於《香乘》之卷次
丁明登，《淑清錄》 <sup>41</sup>	11
王大震，《廣艷異編》	1, 3, 8, 9

<sup>38</sup>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 176-192。

<sup>39</sup>樊樹志，《晚明大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9-80、81-143。

<sup>40</sup>〈晦齋香譜序〉署於「景泰壬申立春月」，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3，頁 536。《香乘》除了將前代香譜，如陳敬《陳氏香譜》等零星資料穿插各卷次間，另有兩卷專門收錄《晦齋香譜》、《墨娥小錄香譜》。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3，〈晦齋香譜〉、卷 24，〈墨娥小錄香譜〉，頁 536-547。其中《墨娥小錄香譜》的著成年代向有爭議，學界歷來有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後期諸說，而據最新考據顯示，此書當成於元末。參葛小寒，〈《墨娥小錄》成書時間小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9：3（2019），頁 5-9。

<sup>41</sup>《千頃堂書目》作《趙清獻公淑清錄》。〔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7），頁 765。



王圻，《稗史匯編》	1, 5, 7
王穉登，《王百穀集》	12
王佐，《新增格古要論》 <sup>42</sup>	2, 9
王肯堂，《證治準繩》	12
田汝成，《炎檄紀聞》	12
李時珍，《本草綱目》 <sup>43</sup>	1, 2, 3, 4, 5, 8, 9, 12
李賢等纂修，《大明一統志》	1, 2, 3, 4, 5, 9, 12
何宇度，《益都談資》 <sup>44</sup>	5, 9
卓明卿，《卓氏藻林》	12
洪應明，《仙佛奇踪》	4
凌稚隆，《五車韻瑞》	9
馬愈，《馬氏日抄》	8
倪綰，《群談采餘》	10
徐禎卿，《翦勝野聞》	7
郭棐纂修，《廣東通志》	25
曹昭，《格古要論》	9
張燮，《東西洋考》	25
陸樹聲，《清暑筆談》	12
湯顯祖，《玉茗堂集》	12
程百二，《方輿勝略》	2, 3, 4, 12

<sup>42</sup> 《香乘》或作王佐《格古論》，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64。

<sup>43</sup> 《香乘》或作《本草》。作《本草綱目》者，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香品〉，頁354-355；卷12，〈香事別錄〉，頁451。作《本草》者，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69-370；卷3，〈香品〉，頁373、376-377；卷4，〈香品〉，頁379、381-382、386、388-389；卷8，〈香異〉，頁411；卷9，〈香事分類〉，頁422。

<sup>44</sup> 周嘉胄於「唵叭香」條後，特別說明所以得見有關「唵叭香」的資料，乃得力於新近出版的《五雜俎》和《益部談資》——「唵叭香，前亦未聞。《五雜俎》、《益部談資》二書近出」。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香品·唵叭香〉，頁396。

費信，《星槎勝覽》	2, 5, 9, 10, 12
慎懋官，《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花木續考》、《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草木考》 <sup>45</sup>	2, 3, 4, 5, 9, 11
楊慎，《均藻》	12
謝肇淛，《五雜俎》	4, 5
顧元慶，《雲林遺事》	1
作者不詳，《嘉靖聞見錄》 <sup>46</sup>	1, 5

上表排除劉基（1311-1375）於元末撰成的《郁離子》<sup>47</sup>，和部分時代不詳的方志；所錄書籍出版時代涵蓋十四至十七世紀，易言之，自明初以迄晚明。其中僅曹昭《格古要論》刊於永樂三年（1405）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前，餘皆成書於宣德八年（1433）七下西洋之後。<sup>48</sup>且撰者包括陸樹聲（1509-1605）、李時珍（1518-1593）、郭棐（1529-1605）、王圻（1530-1615）、王穉登（1535-1612）、卓明卿（約1538-1597）、王大震（約1543-1612）、王肯堂（1549-1638）、湯顯祖（1550-1616）、謝肇淛（1567-1624）、洪應明（1572-1620）、程百二（1573-1619）、張燮（1574-1640）、丁明登（?-1645），還有生卒年不詳，但可由著作、仕歷、親緣判斷的凌稚隆、慎懋官、何宇度，生平均已跨入萬曆。

不過，縱使《香乘》引用明代文獻，幾乎晚於鄭和初下西洋的時代，作

<sup>45</sup>此書書名《香乘》作《華夷續考》、《華夷草木考》或《華夷花木考》。《華夷續考》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66；卷5，〈香品〉，頁392、395；《華夷草木考》見〔明〕周嘉胄，《香乘》，卷3，〈香品〉，頁376-377；卷4，〈香品〉，頁387；卷5，〈香品〉，頁391；卷9，〈香事分類〉，頁423；卷11，〈香事別錄〉，頁439；《華夷花木考》見〔明〕周嘉胄，《香乘》，卷9，〈香事分類〉，頁422。

<sup>46</sup>此參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香乘》無礙庵本，「四庫本」則無《嘉靖聞見錄》書名。此書已佚，但《古今圖書集成》曾摘錄此書，見〔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冊784（上海：中華書局，1934），卷44，〈宮殿部彙考六〉，頁41b。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無礙庵本則見[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wo09/wo09\\_03703/wo09\\_03703\\_0001/wo09\\_03703\\_0001.pdf](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wo09/wo09_03703/wo09_03703_0001/wo09_03703_0001.pdf)，擷取日期2019.5.26。

<sup>47</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香事別錄〉，頁451。

<sup>48</sup>有關鄭和七下西洋的年代和行程概述，參小川博，《中國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203-236。

者亦多活躍於萬曆年間，此書卻未鮮明反映部分學者所稱晚明「在文化上融入世界」的判斷。<sup>49</sup>

### 三、《香乘》涉及西洋的線索

「西洋」之名始見五代。<sup>50</sup>明人著作提及「西洋」者，或指「爪哇以西」、「汶萊以西」，或擴大為廣袤「異域」的通稱；至於「中國」，則往往是認識「西洋」新事物的標尺。<sup>51</sup>至於「西洋」作為一整體地理概念，出現於《香乘》(含引文)的比例，實遠遠不及「中國」；<sup>52</sup>倘非格外留意，否則極易錯失。

<sup>49</sup>樊樹志，《晚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46。

<sup>50</sup>參劉迎勝，〈「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收錄於劉迎勝著，《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中西交流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2。

<sup>51</sup>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嶽山人)謂：「西洋之跡，著自鄭和」，而隨鄭和船隊出航的通事馬歡，其〈紀行詩〉即寫道：「閩婆遠隔中華地」、「閩婆又往西洋去」，閩婆為爪哇(Java)古名，故馮承鈞注解詩句：「觀此足知當時人視爪哇以西為西洋」。張燮則以「文萊(婆羅國)」為「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而「西洋」或因此引伸為廣袤「異域」的泛稱，嘗錄「鄭和下西洋」事之陸容(1436-1494)，便稱哈列、撒馬兒罕、土魯番、哈密諸地為「早西洋」。且「西洋」一詞不僅可以囊括「西域」，正德年間，甚至已「擴大到了包括東、西洋乃至海外諸國之義」。至於「中國」，則往往成為認識「西洋」新事物的標尺，像是位於「廣東海南大海之南」、崇信釋教的「占城國」，馬歡描寫其國人戴冠「如中國副淨者所戴之樣」，如此之例不勝枚舉。參〔明〕黃省曾著，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7。〔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紀行詩〉及注解，頁1；「爪哇國」條：「爪哇國者，古名閩婆國也」，見頁7；及「占城國」條，頁1-2。〔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5，〈東洋列國考·文萊〉，頁102。〔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頁26-27；卷5，頁56。此外，據馮承鈞研究，「考明人著述誌及下西洋事者，有陸容《菽園雜記》、祝允明《前聞記》、歸有光《震川集》、顧起元《客座贅語》、周復俊〈星槎勝覽序〉」。見〔明〕周復俊〈星槎勝覽序〉，收入〔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星槎勝覽序〉，頁2；並參萬明，〈從「西域」到「西洋」——鄭和遠航與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轉折〉，收錄於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9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頁104-113。

<sup>52</sup>光是《香乘》卷1-2所纂資料，便5度出現「中國」一詞。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香品·沉香為柱〉，頁360-361、〈香品·牛易沉水香〉，頁362；卷2，〈香品·雲檀香架〉，頁365、〈香品·瓢香〉，頁370、〈香品·麻樹香〉，頁370。

就明人廣義用法的「西洋」而言，《香乘》所載香物產地，<sup>53</sup>洵以眾多翻譯地名，<sup>54</sup>與「海南諸國」、<sup>55</sup>「西洋」、「東洋」、<sup>56</sup>「大西洋」等泛稱的形式，具體存在於文本中。

「西洋」一詞見於《香乘》者，實際僅有三處：明代香方「西洋片香」之記載、引用《東西洋考》的書名標註，<sup>57</sup>還有「酴醾，海國所產為勝，出大西洋國者，花如中州之牡丹」的摘引。<sup>58</sup>就此看來，相關詞條、詞彙出現的次數實在不多，所以僅能根據脈絡閃現的吉光片羽，推想海上香事於一斑。

前述「大西洋國」不論指葡萄牙、義大利、法蘭西，<sup>59</sup>抑或大西洋沿岸國家的泛稱，既採取以近取譬的策略，將中原名物比擬「大西洋國」之香貨，便恰恰表示兩端地理的遙遠、認識之生疏。一方面，「大西洋國」較諸張燮

<sup>53</sup>「香」或「香藥」與南海周邊區域的貿易，自東晉、南朝便日漸昌盛。溫翠芳，《中古中國外來香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128-135、165-175、340。

<sup>54</sup>如《香乘》引程百二撰《方輿勝略》：「賽瑪爾堪〔撒馬爾罕〕，西域中大國也。產鬱金香，色黃，似芙蓉花。」〔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鬱金香〉，頁371。

<sup>55</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香品〉，頁354。另，「海南諸國」的名稱，見諸唐代姚思廉所撰《梁書》：「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具體包括「林邑國〔越南中部〕」、「扶南國〔中南半島〕」、「盤盤國〔中南半島之馬來半島〕」、「丹丹國〔未確，約在馬來西亞、新加坡一帶〕」、「干陀利國〔蘇門答臘巨港一帶〕」、「狼牙脩國〔馬來半島東岸〕」、「婆利國〔印尼〕」、「中天竺國」、「師子國〔斯里蘭卡〕」。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4，〈列傳第四十八·諸夷〉，頁783-800。

<sup>56</sup>「西洋」、「東洋」對舉成為一組概念，起源於航線的差異——「總之，『東洋』與『西洋』的概念起源於航線的不同。若要論其地理範圍，則『東洋』大體上指其南海以東，而『西洋』則大體指其南海以西地區」。參劉迎勝，〈「東洋」與「西洋」的由來〉，頁1-19。

<sup>57</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5，〈獵香新譜·西洋片香〉，頁551、558。

<sup>58</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香品·酴醾香露〉，頁392。

<sup>59</sup>「大西洋國」指葡萄牙，或將利瑪竇母國義大利混為一談者，參〔清〕魏源輯述，《增廣海國圖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卷38，「布路亞國總記」，頁615、625；與楊繼波，〈明清檔案文獻中對葡萄牙的稱謂〉，《歷史檔案》，1999：4（1999），頁88-91。又，「大西洋國」為法蘭西別名之說，參清代姚瑩所撰官方文書，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冊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363。

《東西洋考》或黃省曾（1496-1546）《西洋朝貢典錄》所指「西洋」，其距離「中州」的「核心」位置更為遙遠；<sup>60</sup>另一方面，相較與南海、印度洋地區的香藥交流中古已然頻繁，直至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海商纔剛在廣州登岸。<sup>61</sup>因此不難想見，時人何以拿牡丹想像醑醑。

「醑醑」一條，附記雖標示源自《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文字卻明顯因襲明代中葉黃衷（1474-1553）所撰《海語》。《海語》之「醑醑香露」（周嘉胄認為即「薔薇露」）條併載：「國人貯以鉛瓶，行販他國，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略不論。直隨舶至廣，價亦騰貴，大抵用資香奩之飾〔飾〕耳」。<sup>62</sup>在此黃衷描述當時走私者，因接觸「夷女以澤體髮，膩香經月不滅」的域外見聞，得以掌握女用奢侈品商機，進一步由「海國」進口物料分裝轉售，以致廣州一帶暹羅海商爭相搶購、市價騰飛的現象。約兩百年後，《紅樓夢》敘述王夫人探望受丈夫賈政打傷的獨子寶玉，攜了兩瓶香露，其中之一即「玫瑰清露」。襲人見其容量稀少不禁笑道：「好金貴東西」，王夫人則提醒：「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sup>63</sup>從此亦可側見，香品受富家權門收藏，「金貴」歷久不衰的狀況。

此類貿易行為所以受到描述，固可視為黃衷「晚年致政家居」燕閒之作；但問題是這位仕途順遂的正統士人，卸下官職後，為何於尚有海禁的正德、嘉靖之際，樂意「就海洋番舶，詢悉其山川風土」？換言之，「不恥下問」於「海賈所傳見聞」，並分類纂成《海語》一書（書成於嘉靖元年）<sup>64</sup>？就黃氏出身海南、終老廣州，長年與海港、賈舶為鄰的地域背景來說，自是容易接觸沿海生計與異國物事；但所以任憑好奇直詢走私者，恐怕還在《海語》成於嘉靖二年（1523）嚴飭海禁之前，<sup>65</sup>當時「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

<sup>60</sup> [明]黃省曾著，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校注》，頁1-2。

<sup>61</sup>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頁116-118。

<sup>62</sup> [明]黃衷撰，[明]黃學準增注，《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中，「醑醑露」條，頁128。

<sup>63</sup>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頁521。

<sup>64</sup> [明]黃衷撰，[明]黃學準增注，《海語》，〈《海語》提要〉，頁117-118。

<sup>65</sup> 晁中辰，《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139-200。

因誘蠻夷為盜」之現象，就其熟稔的沿海口岸，民間早已視若尋常。<sup>66</sup>

同樣倚重賈舶經驗纂輯海外知識，張燮著《東西洋考》也是屢受《香乘》採用的文獻。<sup>67</sup>所引兩處提及「東洋」：其一記載「東洋文萊國」出產龍腦，而文萊亦是「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的東、西洋交界；<sup>68</sup>另一載錄「東洋」者，則事涉「美洛居」——亦即十五至十七世紀位居世界貿易要衝的摩鹿加群島（Moluccas，或稱「香料群島」）：「丁香，東洋僅產於美洛居〔摩鹿加〕，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sup>69</sup>據此條記載，故知當地香料曾引發異族之間的權力競爭。

張氏所稱「二夷」之爭，如依後文進行解釋，很容易認定為美洛居的前、後侵略者，即「佛郎機」（葡萄牙）與「和蘭」（即荷蘭，書中或稱「紅夷」、「紅毛夷」）的利益拉鋸。但推敲「一淵兩蛟，商彼者亦難」之意，實主要針對福建漳州的民間船舶，攜貨至此，各受兩者劫掠、威脅，交易受阻而言。<sup>70</sup>易言之，此與前述因丁香而起的「二夷」之爭，分屬不相干的兩個事件。釐清這一點之後，進而可以推論，倘使丁香之爭發生在與張燮生平重疊的十六世紀後半、《東西洋考》成書的萬曆四十五年（1617）以前，那麼參考羽田正的研究，則應指葡萄牙人與特爾納特島（Ternate，摩鹿加群島的島嶼之一）當地伊斯蘭教徒間，由於丁香貿易主導權而引發的武力衝突。<sup>71</sup>

經歷貿易合作與血腥衝突的過程，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發

<sup>66</sup>〔明〕俞汝輯等編撰，〔明〕林俞堯等纂修，《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99，〈禁令備考·通禁·禁用番香貨〉，頁 779-780。

<sup>67</sup>〈凡例〉：「集中所載，皆賈舶所之」、「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鎔成一片」。〔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19-20。

<sup>68</sup>見〔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獵香新譜·龍腦補遺〉，頁 558。

<sup>69</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獵香新譜·丁香補遺〉，頁 558。

<sup>70</sup>參《東西洋考》，卷 5，「美洛居」條，及謝方〈前言〉。〔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7-8、102。

<sup>71</sup>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頁 84-85。

展出「透過文字、書籍與地圖」累積外國知識的傾向。<sup>72</sup>相較之下，張燮或周嘉胄對此武力衝突，則顯然沒有太大興趣探究。

《香乘》載錄香物見聞，儘管部分來自大洋沿岸的海國、島嶼與港市，但多屬文獻之轉載與爬梳。包括所引明人著作，如《海語》之「皆出舟師、舵卒所親見」，或像《東西洋考》聲稱：「採自海師、賈客之口。」<sup>73</sup>換句話說，親自向海商、水手採集見聞，試圖編纂海外知識者，實際仍屬鳳毛麟爪。況此鳳毛麟爪，畢竟仍屬片段的岸上採訪。

黃、張二人誕生恰好相距百年，前者弘治進士出身，官至僅次尚書之兵部右侍郎，「與〔朱〕應登、顧璘、陳沂輩以詩文擅名」，換言之，與前七子派頗有淵源；<sup>74</sup>後者功名止於萬曆舉人，自號濱海逸史，詩詞古文受鄒迪光（1550-1626）稱譽，視與黃省曾、張鳳翼（1527-1613）、胡應麟（1551-1602）並驅。<sup>75</sup>兩者履歷殊甚，但均出身民間貿易繁盛的閩、粵沿海，當更有機會連結寬廣、複雜的海洋殊域。雖然如此，《海語》或《東西洋考》知識纂輯的動機，未必出自個人好奇；或在本朝利益外，真正產生向外探索的興趣。

#### 四、中國雅正譜系的「疆界」

面向海洋開展相對宏觀的視野，是否意味士人看待「西洋」與「中國」關係的方式，正發生知識結構或意識形態的變化？就黃衷、張燮的例子，恐怕難以立判。對於正德年間仍「素不通中國」的「佛郎機」，黃衷雖表示「不知何種」，卻已意識到「佛郎機」之叩關廣州（縱使為守臣所退），與其勢力擴張

<sup>72</sup>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頁 86。

<sup>73</sup>〔明〕黃衷撰，〔明〕黃學準增注，《海語》，〈《海語》提要〉，頁 117-118；〔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東西洋考》提要〉，頁 137-138。

<sup>74</sup>〔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東西洋考》提要〉，頁 137-138。並參〔清〕郝玉麟等監修，〔雍正〕《廣東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 45，〈人物志二〉，頁 93。

<sup>75</sup>〔明〕張燮著，《東西洋考》，〈《東西洋考》提要〉，頁 137-138。〔明〕鄒迪光，〈霏雲居集敘〉，收錄於〔明〕張燮，陳正統等點校，《張燮集》，冊 1（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2。

至「滿刺加」(麻六甲)、「暹羅」，並非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彼此之間互有連結。<sup>76</sup>換言之，「中國」其實無法自外於「洪濤駭浪，勢如沸鼎，色類藍靛，遙望不極」的海洋，<sup>77</sup>及船舶通行之港埠、國際間，互市爭利的宏觀形勢。

嘉靖二十六年(1547)，佛郎機人與漳州、泉州商賈走私活絡，官府雖以軍事行動執行禁令，結果卻「販者不止」。至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都御史索性「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萬曆年間張燮既先後受海澄縣、漳州府地方官託付，記錄前述的歷史變化，<sup>78</sup>且進一步整理「舶人舊有航海《針經》」，企圖將「每國各自為障子」、「參錯不相聯」的航海路線「鎔成一片」。<sup>79</sup>其所謂「鎔成一片」，乃與各國自為屏障(「障子」)的狀態形成對比。

由此似可推論，如同「鎔」字所隱喻，中國與東、西二洋、甚至大西洋諸國的對應關係，正趨向拓展或開放。然而事實上，縱使張燮著眼貿易需求，支持解除海禁；但相較貿易考量，更為基本的，卻在防止「夷」之侵界——只是策略從被動轉為積極，並以「中國」的優先利益為前提：「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夥者。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介窺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清。」<sup>80</sup>由此可知，海洋與陸地、外與內等界限所以被思慮觸及，尚在「版圖」與「境內」的安定。

換句話說，「中國」為「此」，「東、西洋」之「夷」為「彼」；「自此之彼」僅屬策略，「境內永清」才是目的。因此將海路「鎔成一片」，乃為順遂達成「自此之彼」的途徑；而「彼」、「此」的「障子」，依舊壁壘分明。

橫互在「彼」、「此」間的無形「障子」，亦顯現於明初「番香」與「國香」間——不僅有關產地的差異，同時也涉及文化的區隔。明泰昌元年(1620)由禮部尚書林俞堯等纂修的《禮部志稿》，記錄了「禁用番香、番貨」的官方說詞，此固然攸關經濟利益，但還涉及「華夷之辨」、捍衛文化「純粹性」的意識型態：

洪武二十六年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

<sup>76</sup> [明] 黃衷撰，[明] 黃學準增注，《海語》，卷上，「滿刺加」條，頁 121。

<sup>77</sup> [明] 黃衷撰，[明] 黃學準增注，《海語》，卷下，「分水」條，頁 131。

<sup>78</sup> [明]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 7，〈餉稅考〉，頁 131。

<sup>79</sup> [明]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凡例〉，頁 20。

<sup>80</sup> [明]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 7，〈餉稅考〉，頁 154。



絕其往來，惟琉球、真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消盡。民間禱祀，止用松、栢、楓、桃諸香，違者重罪之，其兩廣所產香木，聽土人自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sup>81</sup>

連兩廣香木也由於可能摻雜「番香」，而不許越嶺貨賣。禁令如此嚴苛，卻恰好顯示「番香」在職貢管道外，沿海民間貿易的熾熱，及此貿易活動，對民間宗教祭祀產生的廣泛影響。態勢既難控制，洪武帝（1328-1398）不得不直接指揮「禮部」。此尤可見當局將「番香」使用等同「移風易俗」，所生起的戒懼與迫亟圍堵。

有關「禁番香」與「民間禱祀」的規範，不只洪武一朝。據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之餘》引《廣東通志》記建文年間「禮部為禁約事」，既有如前遏止「誘引蠻夷為盜」的理由，且「番香」等同「移風易俗」的觀點，不僅繼續沿襲，就公告官員軍民的細則，更清楚點明所謂「我國」與「外番」文化上的差異：

祈神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蒼朮香、蒿桃香木之類，或合成為香，或為末，或各用，以此為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升壇，動輒然香在前。為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為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為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sup>82</sup>

首先是否認「上香之說，上古本無」。換言之，焚香祭祀並非中國原有的習俗。對於這一點，顧炎武先後羅列南宋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

<sup>81</sup> [明] 俞汝輯等編撰，[明] 林俞堯等纂修，《禮部志稿》，卷 99，〈禁令備考·通禁·禁用番香貨〉，頁 779-780。又《明實錄》的記載幾乎與《禮部志稿》全同，但繫此事於「洪武二十七年甲寅」。[明] 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條，頁 3373-3374。

<sup>82</sup> [清] 顧炎武，《日知錄之餘》，收錄於《顧炎武全集》，冊 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 2，「禁番香」，頁 1309。

與唐代韋彤《五禮精義》(今已佚)的記載作為支持的證據。<sup>83</sup>其次則雖遷就「近代」祈禱燃香之習，但企圖藉由禁令，對「國香」與「番香」作出區隔，並使前者取代後者。

「疆界」意識在政治話語的「情境」中受到強調，那麼，「西洋」香物與「中國」文雅傳統，又是否存在實際的「疆界」？「國香」既指「松香、柏香、楓香、黃連香」等；而禁止買賣、存留的「番香」，則有「檀香、降真、茄藍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等。<sup>84</sup>此處「番」、「國」之「疆界」所以嚴明劃分，甚至企圖以法令規範社會實踐，自與鞏固「我中國」的主體意識有關。<sup>85</sup>

但以區隔強調並保存文化優勢的策略，不僅就當代全球史的視角欠缺說服力，即使自明代用香現象觀察，同樣效力有限。一方面「番香」的文化意蘊未必遜於「國香」，根據張珣研究，中西亞、南亞和歐洲施用香的歷史均甚悠長。香在古波斯即象徵身分、地位，而有關宗教用香的初期文獻，既見於羅馬、基督教；印度佛教亦甚早用香，更產生許多以香象徵德行、修行的詞彙。<sup>86</sup>

更加弔詭的是，縱使十四世紀明初官方與部分士人亟欲保障文化純粹性，主張「外番」不得逾越、混淆「中國」的界線；然而事實上，由《香乘》采輯十五世紀《星槎勝覽》所載「番香」產地看來，「外番」涵蓋東南亞、南亞乃至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岸的龐大香物網絡，已然進入「中國」航海者的視野。例如卷 2「檀香」條之「吉里地悶〔帝汶〕」；卷 5「龍涎香」條之

<sup>83</sup> 《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泌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郁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議一也。』考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清〕顧炎武，《日知錄之餘》，卷 2，「禁番香」，頁 1310。

<sup>84</sup> 〔清〕顧炎武，《日知錄之餘》，卷 2，「禁番香」，頁 1309。

<sup>85</sup> 葛兆光主張「制度」、「社會」、「文化」是「中國」自秦漢以後得以長久延續的基礎，但同時聲明此三項「並不是創造一個龐大『帝國』／『王朝』的關鍵，而是維繫『中國』這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得以延續的關鍵」。參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頁 71-82。

<sup>86</sup> 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4：2（2006），頁 37-73。

「龍涎嶼〔蘇門答臘西〕」、「錫蘭山國〔斯里蘭卡〕」、「卜刺哇國〔非洲東岸〕」、「竹步國〔非洲東岸〕」、「木骨都束國〔非洲東岸〕」、「刺撒國〔阿拉伯半島南岸〕」、「矢佐法兒國〔祖法兒國，介於西南亞和阿拉伯半島東南沿海的阿曼〕」、「忽魯謨斯國〔波斯灣、荷姆茲海峽附近〕」、「溜山洋國〔馬爾地夫群島〕」、「飲薔薇香露」條之「榜葛刺國〔孟加拉〕」、「奇藍香」條之「占城〔越南中部〕」、「賓童龍〔越南南部〕」、「唵叭香」條之「唵叭國〔中南半島〕」；卷 9「聞香倒掛鳥」條之「瓜哇國」；卷 10「米香」條之「淡洋〔蘇門答臘 *Tamiang*〕」；卷 12「阿魯國采香」條之「阿魯國〔印尼東部阿魯群島〕」、「喃啞哩香」條之「喃啞哩〔南巫里、南淳里，蘇門西〕」、「舊港產香」條之「舊港〔蘇門答臘巨港附近〕」<sup>87</sup>……儘管在《香乘》中，這些地理空間，僅以瑣細、不連貫的狀態存在；不過作為閱讀對象，倒也琳琅滿目，並時而附帶香物產地令人遐想連翩的傳說。<sup>88</sup>

且就中晚明文本所見，「番香」不僅深入眾多士人生活，更堂皇接榫雅正文明的譜系。<sup>89</sup>據屠隆（字長卿、緯真，號赤水，1543-1605）《考槃餘事·香箋》所述，祭祀、禱告或「祛邪辟穢」外，「香」更遍及各式雅趣橫生、身心怡悅之境體驗：

香之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塌帖，揮塵閑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秘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

<sup>87</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香品〉，頁 364；卷 5，〈香品〉，頁 390、393、395；卷 9，〈香事分類〉，頁 423；卷 10，〈香事分類〉，頁 432；卷 12，〈香事別類〉，頁 446。

<sup>88</sup>例如卷 5「龍涎香」條：「此嶼〔龍涎嶼〕浮濼海而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挈駕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香品〉，頁 390。

<sup>89</sup>有關文化相似／相異特徵與族群認同關係的反思，可參王明珂的研究。王氏指出文化「一元傳播論」與「多元融合論」之共同盲點，在於認定「無論是文化傳播、擴散還是凝聚，都發生在一限定範圍內」，另則強調「『相似』文化特徵」的重要性。然而，其以商周時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的考古證據為例，說明各地區文化的傳播、擴散還是凝聚，實際並不存在明顯的界線；再者，「客觀的文化相似與相異程度，並不是造成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標準」。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頁 407-409。

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燕，香霧隱隱繞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sup>90</sup>

值得注意的是，屠氏認為「沉香」貴「幽雅冲澹」，乃「貞夫高士所宜」，換言之，是具有格調的正經人士所宜親近之物。而「伽南」品質猶勝於「沉香」，居諸香之冠；且不僅「伽南」，《考槃餘事》所錄「降真香」、「安息香」等，莫不屬於「番香」<sup>91</sup>。陳繼儒（1558-1639）在《太平清話》羅列 24 種「一人獨享之樂」，其中「焚香」位列其首，<sup>92</sup>也大抵與此同一脈絡。

「幽雅冲澹」的文化意涵，既是「雅士」身處「番香」裊裊之境，所可能識別、儲存並喚起的身體記憶；<sup>93</sup>那麼所謂「移風易俗」，至少對像屠隆等晚明士人而言，不啻擴大體驗面向的契機。由其感慨「伽南」過於珍稀，以致「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的言說，<sup>94</sup>知此北宋以前尚屬傳聞，至宋元之際始見正式記載的海外奇香，<sup>95</sup>是如何無縫銜接文雅風尚，成為名流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來自「西洋」，且非「中國」傳統用香的「伽南」（「奇藍」），既為奢侈之最，稍晚周嘉胄於《香乘》亦視若珍寶。不但詳加介紹保存之法，更在文物價值的權衡上，賦予極高評價：

奇藍香上古無聞，近入中國，故命字有作奇南、茄藍、伽南、奇南、棋璊等不一而用，……今世所有，皆彼酋長禁山之外產者。如廣東端溪研，舉世給用，未嘗非端，價等常石，然必宋坑下巖水底，如蘇文

<sup>90</sup> [明]屠隆，《考槃餘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 3，〈香箋·論香〉，頁 51。

<sup>91</sup> [明]屠隆，《考槃餘事》，卷 3，〈香箋·論香〉，頁 51。

<sup>92</sup> 「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右皆一人獨享之樂」。[明]陳繼儒，《太平清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2，頁 39。

<sup>93</sup> 有關「香」與「身體感」理論的研究，參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錄於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63-101。

<sup>94</sup> [明]屠隆，《考槃餘事》，卷 3，〈香箋·論香〉，頁 51。

<sup>95</sup> 吳清、韓回之主編，《澄懷觀道：傳統之文人香事文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頁 245。

忠〔蘇軾〕所謂「千夫挽纜、百夫運斤」之所出者，乃為真端溪可寶也。奇南亦然。<sup>96</sup>

巫仁恕在《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引用張維屏研究指出，大量東南亞與日本貨品輸入中國，「改變中國人的消費品味，例如晚明文人士大夫就對日本製造的家具與香品情有獨鍾」；<sup>97</sup>而「奇藍香」在晚明舶來品中，無疑是具體、突出的例子。

縱使「上古無聞」，甚至譯名猶甚分歧，但無礙「伽南」躋身珍品之列。且由前述士人言語透露的渴望，與《香乘》將其與宋人文房「端硯」並舉的敘述，都一再顯示區隔「番香」與「國香」的文化策略，並未有效構成官方所欲規範之價值堡壘。易言之，產自西洋「酋長」之地的土物，透過海上貿易、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的標榜、實踐，加上明代士人訴諸筆端的評價，此等奇貨已然重寫雅正譜系的邊界。

簡而言之，追求「版圖」與「境內」的穩定，或對「移風易俗」採取戒懼與圍堵，雖代表某種政治與文化的正統立場，論述亦頗為強勢；然而實際上「中國」雅正譜系的邊界，就《香乘》等論述以觀，或已悄然隱沒於陸地與海洋、「國」與「番」之間的縷縷香煙。

## 五、瀾漫西洋與中國的複雜氣味

當「伽南」、「沉香」等飄出文雅的居室之外，穿越「番」、「國」，蜿蜒海洋與陸地，更往往糾結複雜、濃烈甚且晦暗的氣味。費信是《香乘》採用書籍作者中，唯一親睹西洋事務者。永樂、宣德年間，其四度隨鄭和出航。<sup>98</sup>《香乘》於「奇藍香」條，先是引述費氏於《星槎勝覽》的記載：「占城奇

<sup>96</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香品·奇藍香〉，頁395-396。

<sup>97</sup>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45；另參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之生活文化〉，《政大史粹》，5（2003），頁69-93。

<sup>98</sup>有關費信與《星槎勝覽》，參伯希和撰，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9-79。

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sup>99</sup>其中「占城」乃屬《星槎勝覽》所述，相對於「采輯傳譯之國」的「親覽目識之國」。<sup>100</sup>故此費氏親歷之航海見聞，無疑稍許揭露香貨與權力結構、甚至暴力手段的關聯。而此關聯，又豈止「西洋」酋長統治之域？

課徵商舶香貨關稅，洵為晚明政府重要財政收入。根據《香乘》所錄萬曆十七年（1589）「陸餉香物稅例」，<sup>101</sup>其中「奇楠香每觔稅銀二錢四分」，稅率之高，甚至為「檀香」木料之百倍。<sup>102</sup>同時內廷與各級官僚，亦大舉裒集海外名香。如嘉靖權臣嚴嵩（1480-1567）庫藏之「檀、沉、速、降各香」竟逾5,000斤，此外尚有「奇南香」3塊、「沉香山」4座。<sup>103</sup>清初朱彝尊（1629-1709）輯《明詩綜》涉及「宮廷用香」之例，更是不勝枚舉。<sup>104</sup>而將《香乘·獵香新譜》之「宣廟御衣攢香」、「御前香」、「內府香衣香牌」、「世廟枕頂香」諸條，與〈宮掖諸香〉相互參照，亦可見明朝內廷承襲前代用香，「合香」<sup>105</sup>成份多採名貴「番香」的狀況。<sup>106</sup>

《香乘》摘自《星槎勝覽》數則文字，除見西洋諸地產香、採香、用香等風俗，<sup>107</sup>與前述酋長視香為禁鬻之事，復透露沿岸走私、異地商舶之外，「天

<sup>99</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香品·奇藍香〉，頁395。

<sup>100</sup>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羅以智跋〉，頁1。

<sup>101</sup> 「陸餉」亦即海關稅中的貨物稅。參黃天華，《中國稅收制度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544。

<sup>102</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5，〈獵香新譜·稅香〉，頁559。

<sup>103</sup> [明]撰者不詳，《天水冰山錄》（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頁122。

<sup>104</sup> 如明代中晚期王章〈秋興〉、朱應登〈孝宗皇帝挽辭〉、劉效祖〈燕京歌〉、戚元佐〈早朝〉、張元凱〈西苑宮詞〉十首之七、李言恭〈顯靈宮〉、陳鳳〈江南〉、朱國祚〈東朝侍直〉二首之一、謝肇淛〈安平署中述懷五十六韻〉、倪元璐〈皇極門頌曆作〉。見[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36，頁1606、卷37，頁1588、卷49，頁2164、卷49，頁2209、卷54，頁2460、卷54，頁2474、卷55，頁2515、卷59，頁2729、卷62，頁2880-2881、卷75，頁3592。

<sup>105</sup> 張珣指出「合香」不僅是唐、宋人取得的技術進展，同時改變了「香」的字義。參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頁37-73。

<sup>106</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5，〈獵香新譜〉，頁548-549。

<sup>107</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香品〉，頁364；卷5，〈香品〉，頁390、393、395；卷9，〈香事分類〉，頁423；卷10，〈香事分類〉，頁432；卷12，〈香事別錄〉，頁446。

朝」挾「兵威」採香的海路痕跡：

其山〔按：九里山〕與滿刺加〔按：麻六甲〕近，產沉香、黃熟香，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逕，有香樹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山中人張目吐舌言：「我天朝之兵威力若神。」<sup>108</sup>

「林木叢生，枝葉茂翠」的熱帶叢林，有如異香氤鬱、魅惑瀰漫的寶山。銜國君之命出航的鄭和團隊，深入山徑，眼前赫然出現數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的香樹；只是緊接視覺奇景的驚呼，敘述對象已陡然轉換——自明國官兵發現香樹的場景，替代為「山中人」大受震懾的表情特寫，及對「我天朝」官兵「威力若神」的感嘆。

聚焦「兵威」的敘述，於《星槎勝覽》尚屬罕見；但於萬曆年間羅懋登的通俗演義《三寶太監下西洋記》，則擴大為推動情節的重要元素。《下西洋記》第 51 回描寫將軍「馬游擊」領兵登「九洲山」採香，明顯襲自《星槎勝覽》載「九里山」事；但將「張目吐舌」於「天朝」官兵的驚嘆，改寫為「滿刺伽國」（麻六甲）之「番王」與眾頭目的對話：

他把天神天將，只當個小郎，堂上一呼，階下百諾。把我們西山黑虎只當個貓兒，呼之即來，殺之即死；把我們海裡的龜龍，只當個曲鱔，要它死它不敢生，要它生不敢死。<sup>109</sup>

引文中「他」即為所見「中國」人物的代稱。其時「滿刺伽國」甫受「大明皇帝」敕封，並呈上包括「黃速香」在內的進貢禮單。待「番王」返朝，便回覆對鄭和船隊充滿好奇的眾頭目；眾頭目聽了，均「嚇得」搖首擺腦，立馬決定朝貢。<sup>110</sup>羅氏俚俗、詼諧而鋪張的筆觸，大加渲染了「下西洋」之所向披靡；無論天界、陸地、海底，「中國」的神威彷彿無遠弗屆。

<sup>108</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香事別錄·九里山採香〉，頁 446。

<sup>109</sup>〔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 51 回，〈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頁 1373。

<sup>110</sup>〔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 51 回，〈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頁 1373。

訴諸通俗的歷史書寫即令恢詭誇奇，卻相當程度反映了市井讀者的期待。《下西洋記》接近結尾不憚詞費，回顧各地進貢禮單中，屢見「奇南香」、「沉香」、「速香」、「降真香」、「龍涎香」、「龍腦香」等，<sup>111</sup>洋洋灑灑遠過於《星槎勝覽》之記載。而第 61 回「有中國才有夷狄。中國居內以制外，夷狄居外以事內。汝等享地平天成之福，不可忘我中國」的論述，<sup>112</sup>則突顯作者羅懋登就算「對外面的世界感到興趣」，立場亦未跨越由「內」視「外」的界域，<sup>113</sup>情節並服膺於「制」與「事」、「恩施」與「回報」相傾互成的權力結構。

除了雜糅權力或暴力的採香痕跡，「香錢」、「香稅」、「香市」、「香船」、「香頭」這些冠以「香」字，與士庶集體熱衷宗教「進香」相關的合義複詞，亦呈現強烈的世俗意涵。鉅額累積的「香錢」，既受明朝中央、地方官府覬覦，因而罕開「香稅」之例，號稱「籍其稅以助國」，也就是邱仲麟所稱「個人捐款國家化、地方稅收中央化」的特殊制度；<sup>114</sup>而張岱（1597-1679）筆下「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的西湖「香市」，<sup>115</sup>與普陀山進香活動中，「大篷網縛，密不通氣，而中藏不盥不漱，遺溲遺溺者數百輩」的「香船」，還有「通嗜欲言語」、打理「飲食水火之事」的「香

<sup>111</sup>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 99 回，〈元帥鞠躬復朝命 元帥獻上各寶貝〉，頁 2678-2702。

<sup>112</sup>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 61 回，〈王明致書古俚王 古俚王賓服元帥〉，頁 1666-1667。

<sup>113</sup> 葛兆光延續並引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研究，認為「歷史上的中國」基本上是把「世界秩序」視同「內部秩序」的延伸，因此將「華」、「夷」或「中國」、「周邊」之間的空間，敘述為由「內」而「外」的三個「同心圓」：分別為圓心「王畿」，內外過渡的「緩服」與「要服」，以及相對於「中國」的「外國」。參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頁 27-28。

<sup>114</sup> 〈香稅志〉：「敘曰：曷云乎香稅也？四方祈禳之士女，捧辦香謁欵款神明，因捐施焉，而有司籍其稅以助國也。夫槩天下香稅，惟岱與楚之太和山也。」[明]查志隆，《岱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3，〈香稅志〉，頁 538。另參蔡泰彬，〈泰山與太和山的香稅徵收、管理與運用〉，《臺大文史哲學報》，74（2011），頁 127-179；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臺大歷史學報》，53（2014），頁 37-132。

<sup>115</sup> [明]張岱著，林邦鈞注評，《陶庵夢憶注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 7，〈西湖香市〉，頁 189。



頭」和尚，<sup>116</sup>均為中晚明世俗國家、社會極具特色的現象與景貌。而這些現象與景貌，皆可與《香乘》所載見聞、知識的相關脈絡互相對照。

## 結語

標舉高逸的古典詩歌，彷彿與「香錢」、「香稅」、「香市」、「香船」、「香頭」等，乃至十五世紀前期明永樂年間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以降全球趨向整合的劇烈變動無關，卻又在同一時空彼此交疊。《香乘》匯集如高啟（1336-1373）：「著物元無迹，游空忽有文」（《焚香詩》）、徐渭（1521-1593）：「陽成罐口飛逃汞，太古坑中刷裊絲」（《香煙》組詩其五）等詩句，<sup>117</sup>均可見香事書寫繫諸「隱逸」傳統的承續。二詩分別在《楞嚴經》香嚴童子「鼻觀」悟道，<sup>118</sup>與道教醫方煉丹的譬喻基礎上，<sup>119</sup>捕捉了香煙飄忽成紋，空靈、迤邐的瞬間變幻。

相對詩人摘藻於香之空靈、變幻，摹擬「史乘」的書寫則立意迥然。《香乘》與香之流動、持有，及其經緯交織的博雅知識、紛雜見聞密切相關。周嘉胄所以傾注畢生之力纂輯，<sup>120</sup>非僅嗜癖使然，更可視為個人嗜癖牽掣於香品流動、持有機制的對策。黽勉著述與「枕上黑甜」儼然兩事，實則互為表裏。按其所述，名香於宮廟、寺院以外，大抵唯有最高集權者足堪享用；至於隱居在野的「草野潛夫」，唯能以「書寫」囊括「嗜物」——所謂「猶得於

<sup>116</sup> [明]張岱著，夏咸淳輯校，《張岱詩文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卷2，〈海志〉，頁253。

<sup>117</sup> [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7，〈香詩彙〉，頁569-570。

<sup>118</sup> 「非本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見《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會解》卷9：「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見《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永樂北藏》（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5），冊185，號1618，頁400a4-5。

<sup>119</sup> [金]郝大通，《太古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卷4，「金丹詩」其14、20、21、26，頁13、15-16。[明]陳實功，《新刊外科正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4，〈雜瘡毒門〉，頁232。

<sup>120</sup> 〈獵香新譜·稅香〉：「余髮未燥時，留神香事，銳志此書，今幸纂成，不勝種松成鱗之感。」[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5，〈獵香新譜·稅香〉，頁559。

穎楮間，挹其芬馥，殊為幸矣」<sup>121</sup>，貌似足堪慰藉，謙卑的字裡行間卻也不乏嘲諷。

焚香、酣睡縱使作為遁世管道，仍終究通往與財富、權勢轆轤甚深的「香世界」。這個建構於「穎楮間」的「香世界」，一方面界中有界，區畛分明；另一方面，「潛夫」、「隱士」的書齋，不僅貫串「國朝大內」、「勛璫」、「夷賈」等階層、群體，甚至穿越「中國」沿岸，向「西洋」的海路往返梭織。《香乘》廣納當代見聞，引文作者亦多跨入萬曆以降的晚明。雖則周氏與這些留下香事痕跡的士人，對海外感興趣的程度，未必及於「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的商販，<sup>122</sup>但如出身粵閩的黃衷、張燮，倒也好奇並覺察於海洋寬廣、複雜的面向。

同時必須釐清的是，將海路「鎔成一片」的企圖，未必能打破視「中國」為「此」，「東、西洋」為「彼」，「彼」、「此」疆域分明的壁壘。而「中國」與「東、西洋」的屏障，亦反映在「國香」與「番香」的區隔。此固然攸關經濟利益，同時涉及捍衛文化「純粹性」的意識形態。弔詭的是，縱使官方與部分士人極力主張「外番」不得逾越、混淆「中國」的界線；然而事實上，「番香」不僅深入士人生活，更堂皇接榫雅正文明的譜系。

穿越「番」、「國」，蜿蜒海洋與陸地，自晚明《香乘》的書寫線索延伸而出，「香」不僅隱沒「中國」傳統雅正譜系的「疆界」，曲折游移於沖淡與奢華之間，且往往與「西洋」連結，流宕濃烈甚且晦暗的氣味。

本文於 2019 年 5 月 26 日收稿；2019 年 12 月 19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劉伊芳

本文撰寫期間，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260-051-），並蒙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sup>121</sup>〔明〕周嘉胄，《香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宮掖諸香·祈雨香〉，頁 408。

<sup>122</sup>見〔明〕周起元，〈序〉，收錄於〔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1。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 〔宋〕洪芻，《香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陳敬，《陳氏香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黃庭堅撰，〔宋〕任淵、〔宋〕史容、〔宋〕史溫注，《黃山谷詩集註》，臺北：世界書局，1960。
-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收入《叢書集成簡編》，冊 48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津逮祕書本排印。
- 〔金〕郝大通，《太古集》，收入《嚴靈峰無求備齋諸子文庫·中國諸子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2。
- 〔明〕周嘉胄，《香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1641）原刊、清康熙元年（1662）印本。
- 〔明〕周嘉胄，《香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8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俞汝輯等編撰，〔明〕林俞堯等纂修，《禮部志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查志隆，《岱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冊 7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傅應星刻本影印。
- 〔明〕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明〕唐寅著，周道振、張月尊輯校，《唐寅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明〕屠隆，《考槃餘事》，收入《叢書集成簡編》，冊 4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張岱著，林邦鈞注評，《陶庵夢憶注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明〕張岱著，夏咸淳輯校，《張岱詩文集·文集·海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明〕張燮撰，陳正統等點校，《張燮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明〕陳實功，《新刊外科正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冊 10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安徽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影印。
- 〔明〕陳繼儒，《太平清話》，收入《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冊 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寶顏堂秘笈本排印。
- 〔明〕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明〕程百二，《方輿勝略》，收入《四庫禁燬叢刊》，史部，冊 2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刻本影印。
- 〔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 〔明〕黃省曾著，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黃衷撰，〔明〕黃學準增注，《海語》，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明〕撰者不詳，《天水冰山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應用科學類》，冊 4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
- 〔明〕羅懋登，《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清〕朱彝尊，《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郝玉麟等監修，〔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6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

1984。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上海：中華書局，1934，據清雍正間內府銅活字排印本縮小影印。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67。

〔清〕魏源輯述，《增廣海國圖志》，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據清光緒乙未年上海書局石印本影印。

〔清〕顧炎武，《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5，光碟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冊 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 二、近人論著

卜正民著，黃中憲譯，《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小川博，《中国人の南方見聞録：瀛涯勝覽》，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

羽田正著，林詠純譯，《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臺北：八旗文化事業公司，2018。

伯希和撰，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吳清、韓回之主編，《澄懷觀道：傳統之文人香事文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

邱仲麟，〈明清泰山香稅新考〉，《臺大歷史學報》，53（2014），頁 37-132。

晁中辰，《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馬幼垣，《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張竹慧，〈香料的百科全書：以《香乘》一書為例〉，《新北大史學》，13（2013），

頁 31-55。

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4：2（2006），頁 37-73。

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之生活文化〉，《政大史粹》，5（2003），頁 69-93。

許振興，〈《皇明祖訓》與鄭和下西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2010），頁 67-86。

陳學霖，〈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2008），頁 163-192。

費爾南·布勞岱爾，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與不可能》，冊 1，新北：廣場出版社，2012。

費爾南·布勞岱爾著，唐家龍等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黃天華，《中國稅收制度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楊繼波，〈明清檔案文獻中對葡萄牙的稱謂〉，《歷史檔案》，1999：4（1999），頁 88-91。

溫翠芳，《中古中國外來香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萬明，〈從「西域」到「西洋」——鄭和遠航與人類文明史的重大轉折〉，收入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9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頁 104-113。

葛小寒，〈《墨娥小錄》成書時間小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9：3（2019），頁 5-9。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

劉迎勝，《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中西交流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劉靜敏，〈丁謂「天香傳」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9（2004），頁 145-174。

劉靜敏，〈宋洪芻及其《香譜》研究〉，《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2（2006），頁 59-102。

- 劉靜敏，〈《陳氏香譜》版本考述〉，《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3（2006），頁 45-78。
- 樊樹志，《晚明大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樊樹志，《晚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
- 蔡泰彬，〈泰山與太和山的香稅徵收、管理與運用〉，《臺大文史哲學報》，74（2011），頁 127-179。

## How do Writings on Incense Represent the World? A Study of the *Records on Incense (Xiangshe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uang, Sin-yu \*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Records on Incens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of the “treatises on incense,” was composed by Zhou Jiazhou. By burning incense and sleeping soundly to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Zhou seemed to want to give up the struggle for wealth and power and to escape from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However, wealth and power we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circul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incense. And so, he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his compilation, not only as an obsession, but also as a countermeasure against his own obsession with the circul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incense. According to his account, aside from temples, only the most powerful could enjoy high-quality incense, while those who lived in seclusion could only fulfill their obsession with it through writing. Was there any type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phenomenon and the voyages to the Indian Ocean by Zheng He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or the dramatic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how did information on aromatic substances from faraway lands find its way into Chinese conventional knowledge of the day? Even though officials and some scholar-gentlemen once advocated banning foreign aromatic substances, western aromatics pervaded the scholar-gentlemen’s life, blending into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high culture.

**Keywords:** Ming dynasty, aromas/incense, China, Indian Ocean, globalizatio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